

■历时3年10个月 ■采访315人 ■拍摄素材1000盘

《我们的留学生活》背后的故事



事先没有任何的铺垫和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连一丁点儿消息都没有透露,一部记录日本留学生生活的纪录片于11月20日在北京电视台第3套节目21点30分播出了,每天一集。记者是在摁着遥控器,从一个个装模作样的电视剧画面中跳来跳去时,发现一组极为真实感人的画面,追踪看下去,才知道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记者看着屏幕的双眼流泪了,电话打到北京电视台对外部,得到的消息是:无论是大使馆的

大使、大学生,还是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连小保姆都随着这些留学生的喜怒哀乐而欢喜和流泪。

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片?竟会这样动人心魄?昨天,记者找到了导演张丽玲在北京的工作室——翠微东里的一个单元,听她讲述拍摄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1989年6月19日,一句日语都不会说的张丽玲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她在东京成田机场走下飞机时,看见同机到达的许多青年眼中,那种对陌生环境的好奇和激动,那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兴奋;也看见一些中年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脸上的茫然和焦虑,以及从心里流露出无助的恐惧,她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原在国内做演员的张丽玲感觉到,此时如果拿一台摄影机架在这里,拍下他们脸上的

表情,告诉大家,这是一些准备拿自己后半生来赌一把的人,谁都会相信的。因为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任何专业演员也表演不出来的。在那一瞬间,她有了要记录下留学生活的想法。

1995年,刚刚在日本著名的大仓商社就职的张丽玲就开始实行她的拍摄计划了。她拿着自己的计划书找到了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著名制片人横山隆晴。这是一个囊括了当年日本纪录片所有5项大奖的人,是日本纪录片制片权威,同时负责十几部纪录片的制作。当他听完张丽玲的创意后说:“你是我见过的第二个中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事我不感兴趣。但是对你这个人我却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你就职的大仓公司是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而拍这样一部纪录片要用5到6亿日元,你没有那么多钱,但你是一个敢想的人。”于是,横山提供给张丽玲一台摄像机,并派给她一个只当过摄影助理的人当摄影师,而另派了一个导演,带一个摄影班子跟拍张丽玲的活动。

1996年3月,张丽玲找到也在日本留学的原中央电视台导演张焕琦开始拍摄了。她只能用每周两天的假日拍摄,拍摄的事物性工作全靠亲属和朋友们帮忙,拍摄的资金是自己三姐妹在日本多年的积蓄,每天的拍摄工作都在18到20个小时之间。拍摄9个月后,横山第一次来到张丽玲的摄制组。那天拍摄了18个小时,从早上到夜里横山没说一句话。收工后,他向张丽玲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以前我以为我是给你们帮了一个大忙,现在我知道我是给你们帮倒忙,我的摄影人员完全配不上你。”横山找到日本一流的纪录片摄影师远藤一弘,问他愿不愿意加盟此片?远藤听完张丽玲的故事,同意放弃每天18万日元的劳务,无偿担任此片的摄影师,摄制组换成了一流的人马。横山为了这部纪录片,推

掉了其它制片工作,放弃了两次升职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剧组。他说:“这部纪录片比我以前拍摄的所有片子都有意义。”

张丽玲就职的大仓公司是家有130年历史的商务公司,张丽玲是做统计。公司知道她在拍片,对她的要求是不影响工作。每周超负荷的工作使张丽玲终于挺不住了。1997年3月15日,在拍摄了一年整时,她病倒了。横山以制片人的身份找到大仓公司,要求破例给她每周四天假。公司同意了,但要求两条:一是所有工作量要完成,二是张丽玲所在部门66个人,不能有一人提出反对。这样一来,张丽玲反而更累了。她每周5天的工作量要在3天赶完,另外4天还玩命拍片,连续几个月每天只睡1个小时。一年半以后,张丽玲剪出了部分样片,拿到公司董事长面前,战战兢兢地说:“这是我一年来做的事,请您看看,我给您翻译。”董事长把录像带放进包里说:“我带回家看,好片子不用翻译也看得懂。”第二天,董事长要求所有的部门负责人都要看这部片子。几天后,张丽玲心情忐忑地来到会议室,公司所有的领导都坐在那里。董事长对张丽玲说:“感谢你给我们公司13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机会。人与人之间,或者国家、民族之间,要先认识、了解,成了朋友之后再合作。你给我们一个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机会。”从这一天起,张丽玲成了大仓公司特殊的职员,不用上班照样拿工资。

张丽玲的故事讲不完了,连日本驻华大使都要看这部片子,她要亲自送去。在此,我们仅摘录几个数字作为这个故事的结尾:这部纪录片从筹备到完成历时3年零10个月,采访315人,跟踪采访66人,拍摄素材带近1000盘,总长度近700个小时。

实习记者 佟奉燕 晨报记者 丁人人